

天主教中文聖經譯本太古史 比較研究：譯本介紹¹

李建峰²

在眾多中文聖經譯本中，屬於天主教傳統的譯本並不算多，其中最為人熟悉和尊崇的是思高聖經，而其他譯本常被忽視，有的甚至很少為現代讀者所知。同時，現代中文語境裡對聖經中譯史的研究常側重整本聖經或整本新約的總體翻譯情況，而不怎麼關注聖經的部分文本。本文嘗試稍微彌補以上兩個方面的不足，向現代讀者介紹涵括太古史的天主教中文聖經譯本，即《古新聖經》、《思高聖經》、《牧靈聖經》、《青年聖經讀本》、《簡易聖經讀本》、《古經略說》和《古經大略》的概況。

¹ 本文係作者對「天主教中文聖經譯本太古史比較研究」系列之一。該系列之二〈總體性探討〉對這幾個天主教中文聖經譯本從體例、語體風格、《古新聖經》的譯文獨特之處、各譯本譯文不準確之處，以及注釋等五個維度進行了比較。該系列之三〈幾個特別方面的探討〉考察了太古史中的聖名、重要人名、重要地名，以及度量衡單位「肘」在這些譯本中的翻譯情況。限於篇幅，本系列之二、三，《神學論集》將陸續擇期刊載，敬請期待。

² 本文作者：李建峰，魯汶大學聖經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創世紀、梅瑟五書、舊約編輯批判、舊約文本批判、舊約敘事批判和聖經律法。現為中國天主教神哲學院客座教師。

引言

論及中文聖經譯本，人們的一般印象是，基督新教自十九世紀初以來各種聖經譯本層出不窮，對新教中文聖經翻譯史的研究也比比皆是。相比之下，天主教的聖經譯本數量上遠遠少於新教，多數現代信眾能想到的只是思高聖經（可能也會想到牧靈聖經）；且對天主教聖經翻譯史的研究也寥寥無幾，尤其是在天主教內部。但其實，天主教在歷史上的中文聖經譯本並未像初看起來那樣少，其譯文及影響力也遠未得到該有的重視。同時，在現代中文語境裡，對聖經中譯史的研究常側重整本聖經或整本新約的總體翻譯情況，而不怎麼關注聖經的部分文本。本文嘗試對以上的不足做適當彌補，以《創世紀》一～十一章太古史為切入點，介紹涵括了太古史的幾個主要天主教中文聖經譯本，即《古新聖經》、思高聖經、牧靈聖經、《青年聖經讀本》、《簡易聖經讀本》、《古經略說》和《古經大略》的大概情況。

近年對天主教中文聖經翻譯史的研究和整理者中，尤以蔡錦圖（Daniel K. T. Choi）最為突出。他在 2011 年發表〈天主教中文聖經翻譯的歷史和版本〉³一文，以及 2018 年出版《聖經在中國：附中文聖經歷史目錄》⁴一書，對天主教中文聖經翻譯史做了比較系統詳盡的介紹。另有一些學者也從不同側面致力

³ 蔡錦圖，〈天主教中文聖經翻譯的歷史和版本〉，《天主教研究學報》2 期（2011），11~44 頁。

⁴ 蔡錦圖，《聖經在中國：附中文聖經歷史目錄》（香港：道風書社，2018），21~98 頁。該書是在蔡錦圖 2011 年文章基礎上的擴充。

於天主教中文聖經翻譯史的探討。⁵ 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特別關注涵括《創世紀》太古史的譯本，介紹這些譯本的大概情況。

一、涵括舊約的天主教中文聖經譯本

天主教譯經史最早可追溯到元朝時期。1305 年，梵蒂岡任

⁵ 對天主教中文聖經翻譯史的其他著述有：P. Bernward Willeke, “Das Werden der chinesischen katholischen Bibel”, in Johannes Beckmann, *Die Heilige Schrift in den katholischen Missionen: Gesammelte Aufsätze* (Schöneck-Beckenried: Administration der Neuen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 1966), pp.124~138；鐘鳴旦 (Nicolas Standaert), 〈聖經在十七世紀的中國〉, 《神學論集》126 期 (2000 冬), 537~565 頁。亦見伊愛蓮等著, 蔡錦圖編譯, 《聖經與近代中國》(香港: 漢語聖經協會, 2003), 15~40 頁; 該文譯自 Nicolas Standaert, “The Bible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in Irene Eber *et al.*, eds., *Bible in Modern China: 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 Monumenta Serica 43 (Sank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1999), pp. 31~54; Daniel K. T. Choi and George K. W. Mak, “Catholic Bible Transla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n Overview”, in Cindy Yik-yi Chu ed., *Catholicism in China, 1900-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hurc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p.105~123; 蔡錦圖, 〈中文聖經的流傳〉, 收錄於海恩波著, 蔡錦圖譯, 《道在神州: 聖經在中國的翻譯與流傳》(香港: 國際聖經協會, 2000), 239~278 頁, 尤其 268~270 頁關於近代天主教會中文譯本的部分; 房志榮, 〈從梵二《啓示憲章》看中文聖經的發展〉, 《神思》45 期 (2000), 1~15 頁; 陳小標, 〈中文聖經翻譯史〉, 2022 年 8 月 7 日取自 <https://www.translatebible.com/chinese-bible-translation-timeline.html>。

命的駐華教廷使節、方濟會會士若望·孟高維諾（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1246~1328）在從元大都寫給教廷的報告中提到，他已將新約和聖詠翻譯成韃靼人日常的語言和文字（大約是蒙古文）⁶；所以可推測其翻譯大約完成於 1305 年或更早的時候。⁷遺憾的是，譯文沒有流傳下來。⁸雖然這個譯本不是中文，但如果沒有失傳，也許可在後代翻譯為中文，從而為中文譯經提供參考。

總體來說，天主教在中國的譯經工作集中發力於明清時期，至近代之前，大部分是對新約的翻譯，尤其是四福音書和《宗徒大事錄》，但也有一些翻譯涉及舊約。

在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的明末清初時期，耶穌會士主要在一些教理著作中翻譯了部分聖經經文。其中一些是對聖經史實的描述，如義大利耶穌會士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的《天主降生言行紀略》（1642 年初，北京）；一些是對聖經經句的摘引和詮釋，如義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的《天主實義》（1595 年初，南昌）、葡萄牙耶穌會士陽瑪諾（Manuel Dias junior，又稱 Eminentiel Diaz，1574~1659）的《天主降生聖經直解》

⁶ “First Letter of John of Montecorvino”, in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 Vol. III,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enry Yule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1916), p. 50.

⁷ Giovanni 死於 1305 年（參：“First Letter of John of Montecorvino”, p. 51）。

⁸ 參：蔡錦圖，《聖經在中國》，23 頁；〈天主教中文聖經翻譯的歷史和版本〉，3 頁；陳小標，〈中文聖經翻譯史〉。

(簡稱《聖經直解》，1636年，北京)以及《天主聖教十誠真詮》(1642年)。還有一些翻譯是用於彌撒經書或祈禱書的教會禮儀經文，如義大利耶穌會士利類思(Lodovico Buglio, 1606~1682)翻譯的《彌撒經典》(1670年)和《司鐸日課》(1674年，北京)等。這些都是文言譯文。⁹ 雖然這些翻譯有一部分涉及舊約，但因為多是零星的對經文的翻譯或詮釋，鑒於本文篇幅，就不考慮收納在本文研究範圍之內。

在清朝初期，雖然天主教會的譯經數量不多，但對後來近現代的聖經翻譯有一定的影響。這個時期的譯本，除了著名的新約方面的白日升譯本¹⁰之外，還有如下譯本：¹¹

1. 法國耶穌會會士殷弘緒(François Xavier d'Entrecolles, 1664~1741)以文言翻譯的《訓慰神編》，是對天主教舊約第二正典中的《多俾亞傳》的翻譯，1730年出版於北京，是中國天主教會出版的第一本聖經單行本。
2. 法國耶穌會會士賀清泰(Louis Antoine de Poirot, 1735~1813)在約1790~1805年間¹²以白話(北京俗語¹³)翻譯了舊約的大

⁹ 參：蔡錦圖，《聖經在中國》，24~25頁；〈天主教中文聖經翻譯的歷史和版本〉，3~4頁。

¹⁰ 即十八世紀初由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傳教士白日升(Jean Basset, 約1662~1707)翻譯的新約部分，其中包括《四史攸編耶穌基利斯督福音之會編》(簡稱《四史攸編》)。參：蔡錦圖，《聖經在中國》，34~43頁。

¹¹ 以下譯本簡介詳見：蔡錦圖，《聖經在中國》，44~93頁。

¹² 關於賀清泰開始和完成《古新聖經》的時間上下限，參：李爽學，〈近代白話文、宗教啟蒙、耶穌會傳統：試窺賀清泰及其所譯

部分（缺《雅歌》和大部分先知書）以及全部新約，稱為《古新聖經》。這是中國第一個白話文聖經譯本。雖然賀清泰在世時《古新聖經》未能出版，但它卻被傳抄下來，是思高聖經出版前最全的天主教聖經譯本。

另外，據傳十八世紀初，方濟會會士梅述聖（Antonio Laghi da Castrocaro, 1668~1727）翻譯了《創世紀》和部分《出谷紀》；另一名方濟會士麥傳世（Francesco Jovino, 1677~1737）對此做了修訂，並增譯到《民長紀》的部分，還譯了《多俾亞傳》和《達尼爾》。可惜他們的譯本沒有流傳下來。¹⁴

清朝中期到民國時期，天主教的中文譯經成果中涉及到舊約的主要有：

3. 耶穌會士沈則寬（Matthias Sen）的一系列官話翻譯和節錄：

- （1）《古史參箴》（舊約和第二正典的節錄；上海慈母堂，1884年）；
- （2）《古史略》（舊約節錄；上海慈母堂，1890年）；
- （3）《古新史略》（《古史略》和1890年上海慈母堂出版的《新史略·宗徒事略》的合編；重慶曾家岩聖家書局，1921年）。

4. 耶穌會士蕭舜華（Hsiao Shun-hua）翻譯了新舊約的節譯《青

《古新聖經》的語言問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42期（2013），61~62頁。

¹³ 蔡錦圖（《聖經在中國》，47頁）認為賀清泰使用的是北京官話，但李爽學認為賀清泰所用的語言「不完全是白話裡的『官話』」，而是當時社會底層老百姓使用的北京俗語（〈近代白話文、宗教啟蒙、耶穌會傳統〉，53~54頁）。

¹⁴ 參：蔡錦圖，《聖經在中國》，29頁。

年聖經讀本》，1941年由天津崇德堂發行。法國耶穌會會士狄守仁（Édouard Petit, 1897~1985）所編的《簡易聖經讀本》包含對新舊約的節譯，部分經文與《青年聖經讀本》相同，部分經過修訂，1955年由香港光啓出版社出版。

5. 吳經熊（John Wu Ching-hsiung, 1899~1986）以文言翻譯了《聖詠釋義初稿》，由蔣介石手訂，1946年發行初稿，1975年修訂。

中國天主教會在解放後出版的聖經譯本中涉及舊約的有：

6. 由義大利方濟會會士雷永明神父（Fr. Gabriele Maria Allegra, 1907~1976）所創始的思高聖經學會翻譯和出版的思高聖經（1968年），是中國天主教會第一部從原文翻譯的新舊約全書。該學會並在1946~1962年之間出版了多本聖經單行冊。經中國天主教主教團核准，大陸在1993年出版了第一本思高聖經。
7. 郭先廣神父以白話文和文言兩種語體形式翻譯了舊約智慧文學中的《箴言》、《訓道篇》和《雅歌》，以書名《中華基督教信友合用聖經芻稿：箴言、廣訓、雅歌》（「廣訓」即《訓道篇》）於1976年在臺灣的聞道出版社出版。
8. 主要由王淩、盧媛媛、李玉、姚安麗和曹雪翻譯的《牧靈聖經》（*Christian Community Bible*），1998年由聖保羅國際出版公司、聖母聖心愛子會國際出版公司、聖言會國際出版公司出版。中國大陸發行於2000年。

本文從以上介紹的譯本中遴選出涵括了《創世紀》太古史

的如下譯本：賀清泰的《古新聖經》、蕭舜華的《青年聖經讀本》、狄守仁的《簡易聖經讀本》、思高聖經、牧靈聖經。沈則寬的《古史參箴》採用通俗小說的形式用白話文改寫聖經故事，不算是嚴格意義上的譯經著作。另外，筆者也無從查閱他的聖經節錄本《古史略》和《古新史略》。因此，沈則寬的舊約譯經著作不作爲本研究的考察對象。

儘管蔡錦圖在 2018 年出版的《聖經在中國》一書裡對以上提到的舊約中文譯本有簡要介紹，但仍有另兩個聖經譯本需要提及，就是德國聖言會會士赫德明（Joseph Hesser, 1867~1920）翻譯的《古經略說》（山東南界教務主教韓准，兗州府天主堂印書局活版，1905 年）和他譯著的《古經大略》（山東兗州府天主堂印書館，1910 年初版，1934 年八版）。《古經略說》譯自伊格納茨·舒斯特（Ignaz Schuster, 1838~1869）當時聞名的德文著作《新舊約聖經歷史》（*Biblische Geschichte des Alten und Neuen Testaments*，1847 年之後在歐洲廣泛使用，被譯爲多種歐洲語言）。¹⁵《古經大略》是赫德明譯著的《聖經故事》（*Biblical Stories*）中的舊約部分，根據赫德明自己所言的，「是從德國很出名的一本書上翻出來的」，指的應該也是舒斯特的《新舊約聖經歷史》，但「同古經略說不全一樣，話比那簡捷，不帶講，就是帶像」（《古經大略·序》）。《古經大略》與其新約部分《新

¹⁵ Cf. Roman Malek, "The Bible at the Local Level: Notes on Biblical Material Published by the Divine Word Missionaries (S.V.D.) in Shandong (1882~1950)", *Monumenta Serica* 64.1 (June 2016), pp. 144~145.

經大略》一起，被中國天主教徒習慣性地稱為「讀本」(School Bible)。¹⁶ 據筆者所知，1980 年代在中國大陸，特別是華北地區，天主教信眾團體中還流傳著《古經大略》和《新經大略》。雖然《古經略說》和《古經大略》不屬於嚴格意義上的譯經作品，而是聖經歷史，但至少其使用的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和一些關鍵譯詞，可以與其他中文譯本相比較，故本研究將其放在考察範圍之內。

在介紹了涉及舊約的天主教中文聖經譯本，並從中遴選出涵括太古史的譯本後，接下來考察這些譯本的大概情況。

二、涵括太古史的天主教中文聖經譯本

在以上譯本中，筆者將蕭舜華的《青年聖經讀本》與狄守仁的《簡易聖經讀本》中的太古史進行了核對，發現後者只在一些標點符號以及個別非重要詞語上與前者有些微差異，主體譯文皆一致。值得一提的是，在天主教中文聖經翻譯史上，蕭舜華常與狄守仁以及另外兩位耶穌會士李山甫 (György Litványi, 1901~1983)、申自天 (René Archen) 並提，也許是因為蕭舜華在完成《青年聖經讀本》(1941 年) 約八年後，與其他三位一起合作出版了《新約全書》(天津崇德堂和北平獨立出版社，1949 年)。因為狄守仁的《簡易聖經讀本》的出版年代 (1955 年) 遠晚於《青年聖經讀本》，又鑒於這四位耶穌會士在翻譯中文聖經方面曾有密切的合作，所以，有可能是狄守仁直接採納了蕭舜華的太古史

¹⁶ Cf. R. Malek, "The Bible at the Local Level", p. 146.

譯文。因此，筆者在比較以上譯本時，將《青年聖經讀本》和《簡易聖經讀本》視作同一譯本。同時，筆者比較了赫德明的《古經略說》和《古經大略》中的太古史部分，行文基本上相同，因此，將兩者也視作同一譯本。

蕭舜華的《青年聖經讀本》譯自雅各伯·埃克（Jacob Ecker）的 *Petite Bible illustrée des Écoles*（Trier: Katholische Hausbibel, 1906, 1910）。舊約部分有一百章，沒有按聖經本身的書卷名分章，而是將《創世紀》到瑪加伯的舊約時期分為原始時代、族長時代、梅瑟時代、民長時代、帝王時代、如達國和義辣爾國、被擄時代和流亡後，很多部分不是經文的節錄，而是類似聖經故事的簡述。但是，《創世紀》太古史大部分是經文節錄。新約部分的安排類似舊約部分，也是將聖經書卷本身的內容從福音到《宗徒大事錄》劃分為不同時期，也分一百章，另有宗徒書信六章和聖若望默示經三章，以及「聖瑪利亞和宗徒們的軼事」。全書最後附有「各瞻禮所誦聖經簡表」。

赫德明在其寫作的〈古經略說序〉中，闡明了他翻譯《古經略說》的主旨。他認為，天主教古經（即舊約）部分關係到天主創世以來的奧義，「既關乎救世者甚大，信友斷不可不知」，但又因古經內容龐雜，「下士游之，浩乎其無涯也」，且不易被大眾理解，「哲人求之，茫然猶若失矣」，因此，赫德明「於其卷中摘其要領，用方言翻譯成本，名之曰古經略說，每節後又加以解勸，俾閱者無論婦孺愚夫，一目了然，皆得悟其旨，而獲其益，增其信主之誠心，加其愛耶穌之熱衷。」《古經略說》

全書共分為 105 章，從《創世紀》開始到「智慧經」，主要是梅瑟五書和歷史書部分的內容，但也有部分先知書和智慧文學的梗略。

在簡要地介紹了《青年聖經讀本》/《簡易聖經讀本》和《古經略說》/《古經大略》的大致情況後，下面從翻譯背景和譯者情況、翻譯底本、翻譯原則、譯本影響等角度，詳細介紹《古新聖經》、思高聖經和牧靈聖經的總體情況。

（一）《古新聖經》

賀清泰譯注：《古新聖經殘稿》（全九冊），李爽學、鄭海娟主編，中國和歐洲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第一冊含《創世紀》，載名〈化成之經〉（《創世紀》一～廿五章）和〈造成經〉（《創世紀》廿六～五十章），《創世紀》一～十一章見〈化成之經〉第 3~47 頁。¹⁷

¹⁷ 近年關於《古新聖經》的研究主要有：李爽學，〈近代白話文、宗教啓蒙、耶穌會傳統〉，51~108 頁（該文也作為李爽學與鄭海娟主編的《古新聖經殘稿》的「導論」，參《古新聖經殘稿》第一冊 1~90 頁）；李爽學，〈賀清泰譯《古新聖經》及其北堂本始末〉，《思想》37 期（2018），177~196 頁；鄭海娟，〈賀清泰《古新聖經》研究〉，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12 年 5 月；鄭海娟，〈薪傳與新詮：《古新聖經》的解經之道〉，《文貝》1 期（2014），55~84 頁；鄭海娟，〈文本之網：《古新聖經》與前後代〈聖經〉漢譯本之關係〉，《清華中文學報》11 期（2014），261~298 頁；鄭海娟，〈文白變遷：從《聖經直解》到《古新聖經》〉，《華文文學》129 期（2015），46~55 頁；宋剛，〈「本意」與「土語」之間：清代耶穌會士賀清泰的《聖經》

賀清泰是法國耶穌會士，1770 年來華。他在華期間困難重重：一方面，教廷在 1773 年解散了耶穌會；另一方面，乾隆、嘉慶年間清廷實行的禁教政策日益嚴厲。在此期間，賀清泰以拉丁通行本（應是 1592 年克肋孟版的拉丁通行本 *Vulgatam Clementinam*；英譯為 *The Sixto-Clementine Vulgate*¹⁸）作為底本，將聖經譯為滿語，稱為《滿文付注新舊約聖書》¹⁹，共 25 卷，包括大部分舊約（含天主教第二正典）以及新約《瑪竇福音》和《宗徒大事錄》²⁰。賀譯滿文版聖經未曾鐫板，其新約抄本藏於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舊約抄本藏於聖彼得堡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而賀清泰的手稿則藏於日本東洋文庫。²¹

譯完滿文版聖經後，賀清泰以 1592 年克肋孟版的拉丁通行本為底本，於 1790 年前後，開始用北京俗語翻譯聖經，大約於 1805 年完成，題為《古新聖經》（「古經」即舊約，「新經」即新約），

漢譯及詮釋》，《國際漢學》4 期，總 5 期（2015），23~49 頁；王碩豐，《賀清泰〈古新聖經〉研究》，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博士論文，2013 年；王碩豐，〈《古新聖經》考〉，《世界宗教研究》2 期（2013），127~132 頁；王碩豐，〈賀清泰《古新聖經》初探〉，《國際漢學》4 期，總 9 期（2016），66~70、201 頁；王碩豐，《早期漢語聖經對勘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7），130~171 頁。

¹⁸ 參：李爽學，〈近代白話文、宗教啟蒙、耶穌會傳統〉，90 頁。

¹⁹ 該名稱參：李爽學，〈近代白話文、宗教啟蒙、耶穌會傳統〉，61 頁。

²⁰ 參：蔡錦圖，《聖經在中國》，48 頁。

²¹ 參：李爽學，〈近代白話文、宗教啟蒙、耶穌會傳統〉，61 頁。

共 36 卷²²（此處的「卷」是中式用法，相當於拉丁通行本全部 73 書卷中的 56~57 書卷²³）。這 36 卷《古新聖經》包含的聖經書卷覆蓋了大部分舊約（缺《雅歌》和大部分先知書；含天主教第二正典中的六本，缺《巴路克》）和全部新約，是在思高聖經之前歷史上最接近完成階段的中文聖經。²⁴ 第一卷名為〈化成之經〉，含創一~廿五章；第二卷名為〈造成經〉，含創廿六~五十章。《古新聖經》的最初手稿應是藏於北京北堂，但是否存世無法確定。²⁵ 流傳於世的抄本有：上海徐家匯藏書樓所藏的清抄本、中國國家圖書館抄本（含兩篇序言及部分聖經書卷，傳抄年代與前者相近），以及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存有的滿漢合璧版《如達國衆王經尾增的總綱》（僅存第十三~廿九章）。²⁶ 2014 年 11 月，由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李爽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助理研究員鄭海娟主要根據徐家匯藏書樓所藏抄本點校重排而成的《古新聖經殘稿》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是目前國內最易見到

²² 關於《古新聖經》的卷數，有 36 卷、34 卷、38 卷等不同的說法，詳參：李爽學，〈近代白話文、宗教啓蒙、耶穌會傳統〉，52 頁，注 5。此處從李爽學，採 36 卷的說法，因為本文第二部分比較分析中所使用的文本《古新聖經殘稿》係主要根據徐家匯藏書樓所藏《古新聖經》抄本點校重排而成，而後者有 37 卷，但其中 1 卷重複，故應為 36 卷。

²³ 參：李爽學，〈近代白話文、宗教啓蒙、耶穌會傳統〉，52~53 頁。

²⁴ 參：陳小標，〈中文聖經翻譯史〉。

²⁵ 參：鄭海娟，〈文本之網〉，262 頁，注 2。

²⁶ 參：李爽學，〈賀清泰譯《古新聖經》及其北堂本始末〉，189~190 頁。

的《古新聖經》版本。²⁷

作為中國第一個白話文聖經譯本，賀清泰的譯文放棄了以前譯本所使用的文言文，改用白話文中的北京俗語（或稱土語）。關於這選擇的原因，賀清泰在〈《聖經》之序〉中論述道：「《聖經》者，不是人說的平常話，乃是天主之意、天主之語」，因此，譯者在翻譯聖經時，「共總緊要的是道理，貴重的是道理，至於說的體面、文法奇妙，與人真正善處有何裨益？」他又在〈再序〉中強調，天主使用俗語說事，是「要高明的或愚蒙的都能容易懂得、也深深記得要緊的道理」；天主既然「貴重的不過是人的靈魂，聰明、愚蒙天主不分別」，因此「為幾個懂文法的人，不忍耽擱了萬萬愚蒙的人，不能懂文深的書，他們的靈魂也不能得受受益」。可以說，賀清泰之所以使用白話文譯經，是因為他將乾隆、嘉慶時期北京社會底層的老百姓作為讀者群體，並認為使用白話文比用文言文更能傳達聖經的原意，尤其因為文言文譯經（在他看來）容易過於追求「說的體面、文法奇妙」。但另一方面，這也與至少從乾隆年代起耶穌會因清廷禁教而由士大夫階層轉向底層百姓傳教的傾向有關。²⁸

李爽學認為，賀清泰在以拉丁通行本為底本譯經時，受到

²⁷ 除該現代重排版之外，徐家匯藏書樓抄本的影印重刊本收錄在鐘鳴旦、杜鼎克和王仁芳所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13），28~34冊，但一些聖經書卷的名稱與《古新聖經殘稿》略有差異。

²⁸ 參：李爽學，〈賀清泰譯《古新聖經》及其北堂本始末〉，82~83頁。

拉丁文的牽制。他觀察到：

《古新聖經》的句法多數生硬，不是少了個所有格，就是缺了個時間標示；有時動詞倒裝得像日文，有時插入句連連如英語。不用想像力予以增補或刪刈，能懂者十之七、八而已。然而，在這種種多數生冷而中國白話文首見的歐化體翻譯腔中，我們強烈感受到某種新句法正在中國史上如蛹之破繭而出，過程艱辛卻充滿熱誠。²⁹

將賀清泰在《古新聖經》中的譯文放在從明末以來的白話文發展運動的大背景中去看，李爽學認為，「就歐化體白話文而言，《古新聖經》的中譯甚且在史上還有首役之功。」³⁰

除了用白話譯經這一特色，賀清泰還強調，翻譯要尊重原文。所以，譯經者需要「虔誠謹慎，惟恐背離《聖經》本意，《聖經》大道即錯亂了」（〈《聖經》之序〉）；在翻譯過程中，「翻譯的書合對本文，全由不得人或添或減，或改說法，恐怕有錯處」（〈再序〉）。

《古新聖經》約 150 萬字，除了經文正文，還有大量採取「論說」或「議論」形式的注解，李爽學認為是歷來譯經著作中所沒有的。³¹ 這些注解放在經文每一章（賀清泰稱之為「篇」）的末尾。另外，除了總的〈《聖經》之序〉和〈再序〉外，在少數舊約書卷（審事官經〔《民長紀》〕、衆王經書〔《撒慕耳紀》〔上、下〕〕

²⁹ 參：李爽學，〈賀清泰譯《古新聖經》及其北堂本始末〉，88 頁。

³⁰ 同上，89 頁。

³¹ 同上，54 頁。

和《列王紀》〔上、下〕、若伯經〔《約伯傳》〕、達尼耶耳經〔《達尼爾》〕前面附有簡短的〈序〉。整本聖經的最後，還加了兩個附錄：附錄一是「徐家匯藏《古新聖經》與《聖經》思高本、和合本、武加大本卷目對照表」，附錄二是「《古新聖經》重要專有名詞對照表」。

賀清泰所譯《古新聖經》雖然沒有付諸鐫刻，但其譯文被後人傳抄，對後來的譯經產生了一定的影響。³² 李爽學認為，新教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曾見過《古新聖經》中至少歷史書部分的抄本，馬禮遜還似乎推崇賀清泰的「俗話體」。³³ 鄭海娟則主張馬禮遜在譯《神天聖書》期間，很有可能從一位羅馬駐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處獲得了一份賀清泰所譯的福音書抄本。³⁴ 另外，雷永明神父曾在 1935 年開始譯聖經之前，專門到北京的北堂圖書館查閱《古新聖經》，將之全部拍照留存，裝訂成相本，並在他最初譯經時沿用了《古新聖經》中的很多譯名和詞彙。目前香港思高聖經學會尚存有雷神父當年拍攝的《古新聖經》照片中的一部分，共 308 張。³⁵

³² 同時，賀清泰的譯文也借鑒了《古新聖經》之前的聖經中譯本。鄭海娟根據其對賀清泰的新約譯文與《古新聖經》之前的 1636 年耶穌會士陽瑪諾翻譯的《聖經直解》（對四卷福音書的節譯）和白日升翻譯的《四史攸編》的比較分析，認為前者與後兩者「存在明顯的互文關係」（《文本之網》，279 頁）。

³³ 參：李爽學，〈近代白話文、宗教啟蒙、耶穌會傳統〉，98 頁。

³⁴ 參：鄭海娟，〈文本之網〉，286 頁。

³⁵ 參：鄭海娟，〈賀清泰《古新聖經》研究〉，140~145 頁；鄭海娟，〈文本之網〉，280~286 頁；李爽學，〈近代白話文、宗教啟蒙、

因此，總的來說，賀清泰所譯的《古新聖經》是在思高聖經之前歷史上最接近完成階段的中文聖經，其譯文直接為後來的譯經者——如馬禮遜和以雷永明為代表的思高聖經學會——提供了借鑒。同時，作為中國第一個白話文聖經譯本，其歐化體白話文對明末以來的白話文運動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二）思高聖經

思高聖經合訂本初版於 1968 年 12 月，由思高聖經學會在香港發行；1999 年 12 月發行禧年版；2012 年 9 月發行修訂版。現盛行的紙質版為《聖經：七十周年版》，由香港思高聖經學會於 2015 年 12 月發行。另可參網頁版：思高聖經七十周年版：

http://www.sbofmhk.org/pub/body/cpray/cl_online_bible/index.html

大陸目前最新的思高聖經紙質版版本如下：

《聖經：思高聖經出版 50 周年紀念（1968-2018）》，北京：中國天主教主教團，2018 年 10 月印刷。

思高聖經的翻譯歷經三十餘年³⁶，不僅是第一個譯自原文

耶穌會傳統》，99 頁，尤其注 126。

³⁶ 關於思高聖經翻譯史，可參：雷永明，《雷永明神父回憶錄》，韓承良譯（香港：思高聖經學會，1987）；劉賽眉、王敬弘，《聖經十講》（香港：思高聖經學會，2004），75-80 頁；Arnulf Camps, O. F. M., “Father Gabriele M. Allegra, O. F. M. (1907-1976) and the Studium Biblicum Franciscanum: The First Complete Chinese Catholic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in *Bible in Modern China: 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 eds. Irene Eber, Sze-Kar Wan and

（希伯來文、阿拉美語和希臘文）的天主教聖經全譯本，也是中國天主教界目前為止最普遍使用的中譯本。思高聖經學會的創始人——真福雷永明神父——先是在 1935~1944 年間獨自完成了舊約的初譯，又在 1945 年成立思高聖經學會（*Studium Biblicum Franciscanum*），帶領幾名華人成員開始了聖經的譯釋和修訂工作。隨後的十幾年期間，思高聖經學會翻譯和出版了新舊約的單行冊。其中，1946~1948 年間，在北平方濟堂出版的有：《聖詠集》（1946 年）、智慧書（含《約伯傳》、《箴言》、《雅歌》、《訓道篇》、《智慧篇》和《德訓篇》，1947 年），以及梅瑟五書（1948 年）。1948

Knut Walk, in collaboration with Roman Malek,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43* (Sank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1999), pp. 55~76, 該文的中譯參：卡孟斯（Arnulf Camps），《雷永明與思高聖經學會：天主教首部完整的中文聖經》，蔡錦圖編譯，《聖經與近代中國》（香港：漢語聖經協會，2003），41~60 頁；Raissa de Gruttola, “The First Catholic Bible in Chinese: Gabriele Allegra and His Trans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ea Studies* 10.1 (2015), pp. 5~23；Idem, “Translating the Bible into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Features of the *Sigao Shengjing*”, in *Between Texts, Beyond Words: Intertextuality and Translation*, ed. Nicoletta Pesaro, *Translating Wor(l)ds 2* (Venezia: Edizioni Ca’Foscari, 2018), pp. 13~47；Idem, “Gabriele Allegra and the *Studium Biblicum*: Translating the Chinese Catholic Bible”, in *Foreign Missionaries and the Indigenization of the Chinese Catholic Church*, ed. Cindy Yik-Yi Chu, Catholic Studies Publication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arch Series 9 (Hong Kong: Cener for Cathol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7), pp. 101~123；勞伯墳，〈聖經中譯：一些觀察和反思〉，宋蘭友譯，《神思》76 期（2008），84~103 頁，此處參 91~94 頁。

年思高聖經學會南遷香港後，發行的單行冊有：歷史書第一冊（《若蘇厄書》至《列王紀下》，1949 年）、歷史書第二冊（《編年紀上》至《瑪加伯下》，1950 年）、先知書第一冊（《依撒意亞》，1951 年）、先知書第二冊（《耶肋米亞》至《厄則克耳》，1952 年）、先知書第三冊（《達尼爾》至《瑪拉基亞》，1954 年）、福音書（1957 年）、新約第二冊（《宗徒大事錄》至《希伯來書》，1959 年）、福音書（重印，1960 年），以及新約第三冊（《雅各伯書》至《若望默示錄》，1961 年）。³⁷ 1961 年，思高聖經學會開始新舊約合訂本的工作，舊約部分的修訂工作從 1963 年年末開始，具體負責《創世紀》修訂工作的是李士漁神父。學會最終於 1968 年 12 月在香港正式出版發行思高聖經的合訂本。因思高聖經學會奉真福董思高（Blessed John Duns Scotus）為主保聖人，故取「思高聖經」的名稱。

思高聖經的舊約翻譯主要使用的原文底本（即瑪索拉文本），是國際通行的希伯來聖經（Biblia Hebraica，以下簡稱 BH）的第三版（1929~1937）³⁸。同時，思高聖經所參考的瑪索拉文本之外的其他古本的版本有：七十賢士譯本方面，根據的是亨利·斯韋特（Henry B. Swete）編輯的《七十賢士譯本希臘文舊約》³⁹；拉丁通

³⁷ 參：蔡錦圖，《聖經在中國》，77 頁。

³⁸ Rudolf Kittel and Paul Kahle, eds., *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 Württembergische Bibelanstalt, 1929~1937).

³⁹ Henry B. Swete, *The Old Testament in Greek according to the Septuagi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參：劉賽眉、王敬弘，《聖經十講》，77 頁。這套三卷本的书初版於：第一卷，1887 年；第二卷，1891 年；第三卷，1894 年。

行本方面，根據的是格拉提卡主教（Mons. L. Grammatica）出版的拉丁通行本聖經（the *Vulgate*）；翻譯中還參照了早期的敘利亞通俗譯本頗西塔（Peshitta）。⁴⁰ 另外，一些聖經書卷因其原文的特殊性，其翻譯底本酌情做了特殊處理：

- ✧ 《德訓篇》以《七十賢士譯本希臘文舊約》為主要底本，兼參照希伯來文殘卷、拉丁通行本和敘利亞譯本頗西塔⁴¹；
- ✧ 《撒慕耳紀》因原文多處殘缺，殘缺處以七十賢士譯本以及七十賢士譯本的修訂本，如阿桂拉（Aquila）和特敖多削（Theodotion）等希臘文譯文修訂⁴²；
- ✧ 《多俾亞傳》和《友弟德傳》主要參考西乃抄本（Sinaiticus）⁴³；
- ✧ 先知書中，《依撒意亞》和哈巴谷的翻譯有時參照死海古

⁴⁰ 參：劉賽眉、王敬弘，《聖經十講》，77 頁。

⁴¹ 此處的敘利亞譯本係根據思高聖經〈序〉。劉賽眉和王敬弘（《聖經十講》，77 頁）根據趙維本的《譯經溯源：現代五大中文聖經翻譯史》（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93，80 頁），僅提到希伯來文殘卷和拉丁通行本。

⁴² 參：劉賽眉、王敬弘，《聖經十講》，77 頁。

⁴³ 思高聖經〈序〉認為主要參考西乃抄本的是《多俾亞傳》和《友弟德傳》。劉賽眉和王敬弘（《聖經十講》，77 頁）參考了思高聖經學會，《舊約史書下冊》（香港：思高聖經學會，1950，VI 頁），認為主要參考西乃抄本的是《多俾亞傳》和《艾斯德爾傳》的附錄部分。但《舊約史書下冊》VI 頁只含糊地提到，「《艾斯德爾傳》內所謂『次經』的附錄，我們全安插在書中適宜的地方，因為將此附錄如拉丁通行本置於傳末，究竟不夠顯明，久已為多數學者所不滿。」因此，《舊約史書下冊》VI 頁並沒有提到《艾斯德爾傳》的附錄部分是根據西乃抄本。但《舊約史書下冊》409 頁標明，《艾斯德爾傳》附錄部分的翻譯是按照希臘譯本。

卷的有關經卷。⁴⁴

當然，所有這些古本傳統在思高聖經 1968 年面世之後都有了很大發展，出現了新的版本，而思高聖經在翻譯時，「撒瑪黎雅五書」迄今為止最權威的版本（2010）⁴⁵ 遠未面世。同時，思高聖經似乎也沒有參考阿拉美語的塔爾古木（Targumi）。在中譯本方面，思高聖經學會在翻譯舊約的過程中，參考了賀清泰的《古新聖經》和新教的《委辦譯本》。⁴⁶

劉賽眉和王敬弘於《聖經十講》中提到了思高聖經翻譯時秉持的以下六條翻譯原則，其中，前三條涉及對待底本和其他古本的原則⁴⁷，後三條涉及近代多語言譯本、章節安排，以及信、達、雅等問題：

⁴⁴ 參：劉賽眉、王敬弘，《聖經十講》，77 頁。

⁴⁵ Abraham Tal and Moshe Florentin, eds., *The Pentateuch: The Samaritan Version and the Masoretic Version* (Tel-Aviv: Tel-Aviv University Press, 2010). 此外，還有一個稍早的版本：Abraham Tal, ed., *The Samaritan Pentateuch. Edited according to MS. 6 (C) of the Shekhem Synagogue*, Texts and Studies in the Hebrew Language and Related Subjects 8 (Tel-Aviv: Tel-Aviv University Press, 1994)。

⁴⁶ 參：劉賽眉、王敬弘，《聖經十講》，77 頁。

⁴⁷ 關於這三條對待底本和其他古本的原則，筆者另有文章進行評論和分析，指出了思高聖經當時因文本批判的時代局限等因素，在文本批判方面存在的不足。參：拙著，〈舊約中文聖經語境和翻譯實踐中的文本批判：以創世紀為例〉，擬載《基督教學術》（上海：三聯書店）第 28 輯中。

1. 翻譯時一律依據原文，如原文殘缺，則以最古的譯本補充；如沒有好的譯文，就以其他相關的經文意義補充。如這一步也不能達到，則加點以示殘缺。
2. 儘量不修改原文，除非古譯文與原文用字不同，而譯文又較原文更合上下文義，或明知是原文抄錯，就會修改原文。
3. 如原文版本之間有異，則參考古譯本；如意義有難有易，則取較難者，因較易的經文可能經過後人的修改。
4. 參考多種各國語言譯本，觀察其如何以近代語言表達經義。
5. 對原文章節絕不變動，如多種聖經學者們對某章節主張移動，卻沒有古譯本為根據，則仍不會變動。
6. 翻譯時盡力保存原文的語風及語氣，並以「信」為主，「達」為次，「雅」則不及前兩者重要。但也不可過於依字直譯，反使經文意義更為不明或過於生硬，失去翻譯的意義。⁴⁸

除此之外，雷永明神父還在思高聖經學會修訂譯文的過程中特別強調：譯文應平易文雅，要尊重和反映聖經原文文體的不同；兼顧信、達、雅；在保持典雅中文的同時，應盡可能保留一些閃族語言的風格；譯者應熟悉聖經原文所用的語言文字和歷史文化；應使用適當準確的宗教術語。⁴⁹ 這些觀察和建議對以後的聖經中譯實踐也有很大參考價值。

⁴⁸ 參：李士漁，〈聖經學會三十年的沿革與工作梗概〉，《鐸聲》第13卷第8期（1975），35頁，轉引自劉賽眉、王敬弘，《聖經十講》，77~78頁。

⁴⁹ 參：劉賽眉、王敬弘，《聖經十講》，79頁。

除了經文正文外，思高聖經還附有大量的介紹性和注釋性文字，屬於翻譯學上所謂的「厚重翻譯」(thick translation)。首先，每卷書前面加有引言，長度一般半頁到一頁左右，介紹該卷書的名稱緣起、主要內容、結構、神學主題、特點等，有的還涉及成書年代和作者。其次，整本聖經之前有「新舊約全書總論」、「梅瑟五書引論」(2015年改為「梅瑟五書概論」)、「智慧書概論」和「先知書總論」(2015年改為「先知書概論」)、「十二小先知總論」(2015年改為「十二小先知概論」)。2015年12月，思高聖經學會為紀念學會成立七十周年，在香港發行思高聖經七十周年版，對內容進行了校對，還統一了總論、導論、概論等用語，增加一向缺少的「舊約全書導論」和「歷史書概論」，並重新編排了附錄「年表」。這些總論、導論和概論可以幫助讀者對舊約的每一部分有清晰的整體理解。再次，思高聖經在經文正文所在頁面底部，有對經文的注釋，幫助讀者理解經文。這些總論、導論、概論、引言和注釋相比《古新聖經》，體系上更全備，體量也大了很多。最後，整部聖經附有各種插圖和附錄，對重要的聖經文化現象或專門問題進行了闡釋和說明。

(三) 牧靈聖經

牧靈聖經，由王淩、盧媛媛、李玉、姚安麗、曹雪翻譯，王淩、曹雪擔綱責任編輯，于賀神父(Fr. Bernard Hurault, 1924-2004)作為注釋作者及翻譯顧問，1998年於香港由聖保羅國際出版公司、聖母聖心愛子會國際出版公司、聖言會國際出版公司發行。

大陸簡體字橫排版發行於 2000 年。

牧靈聖經的初版由法國聖母聖子愛心會于賀神父翻譯，1972 年在智利以西班牙文出版，取名 *La Biblia Latinoamérica*，字面意思為「拉美聖經」。此後的三十年，牧靈聖經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很受歡迎⁵⁰，並被陸續翻譯成多種語言，在亞洲和非洲一些國家的教會大力推廣。英文版牧靈聖經 (*Christian Community Bible*) 1988 年在菲律賓馬尼拉出版，其扉頁上注明它是由原文翻譯而來，但于賀神父在最初翻譯西班牙文版的牧靈聖經時，具體參照了哪些原文版本似乎無從得知。⁵¹ 中文版牧靈聖經主要是由英文版翻譯而來，繁體版於 1998 年在香港教區出版；簡體版則經中國天主教主教團教務委員會准許，於 2000 年在中國大陸發行。

于賀神父在 2001 年談及翻譯中文版牧靈聖經的初衷時說：「聖經不該只躺在祭壇上，受人崇敬。它要與教友一起生活，做我們信德的食糧。」他並指出牧靈聖經的兩個主要特點：「首先就是淺顯易懂但忠於原著的經文；其次，使書中含有回

⁵⁰ 參：Bernard Hurault，〈《牧靈聖經》譯者的話〉，《中國天主教》1 期，總 91 期（2001），31 頁。

⁵¹ 筆者參考的牧靈聖經英文版，是由南京愛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的第 48 版：Bernardo Hurault, *Christian Community Bible*, main editor Patricia Grogan, FCJ, imprimatur Catholic Bishops' Conference of the Philippines, Pastoral Bible Foundation (Bangalore, India: Claretian Publications, 2010)。其扉頁上寫有："Complete text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language with introductions and commentaries for the Christian communities and for those who seek God"。

答教友疑難問題的注釋，藉此為教友提供聖經常識，並力爭避免使用晦澀難懂的语言。」⁵² 中文版牧靈聖經的〈序〉也指出了這兩個特點，並特別強調：牧靈聖經各書卷的前言和注釋「非常接近當代讀者意識」，「注釋很具牧靈特色」，注釋內容注重「文化整合與更新，並不斷地把當今普世教會的新經驗加進進去」。

中文版牧靈聖經的〈序〉還指出，舊約及新約前面的〈打開舊約的鑰匙〉及〈打開新約的鑰匙〉等聖經概要講解，可「使讀者對聖經能有初步的了解與宏觀概念」；其中，前者闡釋了「盟約」、「天主聖言」、「救主天主」、「以色列的土地」、「耶路撒冷和聖殿」、「司祭和先知」、「默西亞」、「天主的肖像」等重要概念。在〈序〉之後，還附有〈聖史概要與日期〉，分別列出了舊約和新約的主要時期和歷史事件。此外，舊約和新約之前還分別設有〈舊約引言〉和〈新約引言〉。

但是，牧靈聖經的書卷排序沒有完全按照思高聖經（基本遵循了拉丁通行本的書卷排列順序），亦未完全按照希伯來聖經（以希伯來聖經的最新全本 *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簡稱 BHS〕為準⁵³），而是二者的混合體，讀者使用起來難免不便。具體來說，牧靈聖經的不同排序在於：

⁵² Hurault, 〈《牧靈聖經》譯者的話〉, 31 頁。

⁵³ Wilhelm Rudolph and Karl Elliger eds., *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 (Stuttgart: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1967~1977), fünfte, verbesserte Auflage 1997.

1. 與希伯來聖經相似，將先知書調整到了聖卷之前，但又將希伯來聖經裡屬於聖卷部分的《編年紀》（上、下）和《厄斯德拉》（上、下）按思高聖經的分類，列入了歷史書部分；
2. 達尼爾在希伯來聖經裡屬於聖卷，在思高聖經裡屬於先知書，牧靈聖經對其安排遵循了思高聖經；
3. 在思高聖經裡，《盧德傳》和《艾斯德爾傳》屬於歷史書，《哀歌》屬於先知書，但這三本書均被牧靈聖經按希伯來聖經的劃分放入了聖卷部分；
4. 天主教第二正典的七本書中，《瑪加伯》（上、下）被按思高聖經的分類列入了歷史書，放在了《厄斯德拉》之後；剩餘的五本——《多俾亞傳》、《友弟德傳》、《巴路克》、《智慧篇》、《德訓篇》——均被列入聖卷，而在思高聖經裡，《多俾亞傳》和《友弟德傳》屬於歷史書，《巴路克》屬於先知書，《智慧篇》和《德訓篇》屬於智慧文學；
5. 牧靈聖經對聖卷內部各書卷的排序沒有完全遵循任何先前既有的傳統，尤其是將《聖詠》放在了整本舊約的最後。

中文版牧靈聖經發行後，一些天主教徒表示歡迎，但也出現了一些批評的聲音。中文版在翻譯的準備過程中，于賀神父曾有意邀請香港的李子忠參與，但因李子忠堅持聖經應從原文（希伯來文和希臘文）翻譯，而于神父堅持從現有的牧靈聖經外文版（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翻譯，兩人遂未達成合作。在繁體中文版牧靈聖經發行前，李子忠曾受香港湯漢主教委託校閱其草稿，發現了一些翻譯上的錯誤，有的甚至直接照搬英文版裡面

的錯誤，認為「譯者既不從聖經原文翻譯，更欠缺一般必要的聖經常識」。但同時，李子忠也稱讚牧靈聖經的注釋「充滿牧民意識、民族文化和生活實踐」，並且「有不少本地色彩，與民族、文化、歷史有密切關係，而且十分生活化。」⁵⁴ 房志榮神父認為，至少從李子忠給出的例子看⁵⁵，牧靈聖經「真涉及信仰和倫理的錯誤似乎也不易找到」，而且它「確有很多有用的材料，特別是註腳和每段的主旨方面」。⁵⁶ 房神父也認同李子忠的意見，認為牧靈聖經「在目的、物件、格調各方面，都與思高聖經不同，並不取替後者的重要地位。」⁵⁷

結 語

天主教的聖經翻譯從明清時期起發力，在之後的約四百年期間，留下了為數不多的舊約譯本，其形式有節譯、單行冊、近全譯本（《古新聖經》），以及現代的全譯本（思高聖經和牧靈聖經）。在這些舊約譯本中，《古新聖經》、思高聖經、牧靈聖經、《青年聖經讀本》、《簡易聖經讀本》、《古經略說》和《古經大略》包含了《創世紀》太古史部分的譯文。本文對這些譯本的大概情

⁵⁴ 李子忠，〈《牧靈聖經》記實〉，2022 年 8 月 19 日取自天主教在線：<https://www.ziliaoqzhan.org/article/bible/edition/2008-11-04/2235.html>。

⁵⁵ 筆者查看了後來的牧靈聖經版本，發現李子忠所枚舉的一些錯誤已經在新版本中得到更正。

⁵⁶ 房志榮，〈從梵二《啓示憲章》看中文聖經的發展〉，13 頁。

⁵⁷ 同上。

況，尤其是其翻譯背景和譯者情況、翻譯底本、翻譯原則、譯本影響等方面，進行了基本梳理。有了這些總體上的瞭解和把握，讀者也許能夠更好地去辨析和欣賞不同譯本對相同的原文經文是如何呈現的、為何這樣呈現、其譯文帶有怎樣的時代色彩、體現了譯者怎樣的個人特質，以及不同時代的不同譯本之間可能有怎樣的相互影響。

從中文譯經史看，這些譯本從來都不是孤立的，即使是零星的節譯和單行冊，也為更大規模的譯經做了一定的準備，而接近全譯本的《古新聖經》對後來的思高聖經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思高聖經對牧靈聖經更是影響巨大。從這個意義上講，不同的譯本像是穿越了歷史長河，在聖經翻譯這一漫漫長路上，一代一代地將不同譯者的努力與心血傳承下去，將聖言的種子播撒開來。